

一個陰謀家的發迹史

康生外傳



康 生 外 传

林青山 著

D535/52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88 · 北京

责任编辑：王振杰

康生外传

林青山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外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：14.75 字数：320千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7-5006-0463-7 / K·56

印数：00001-80000 定价：5.00元

目 录

引 子.....	1
一 胶县富户.....	3
二 三十六计,走为上计.....	22
三 借刀杀人.....	41
四 继续勾结.....	57
五 更换门庭.....	78
六 借机开刀.....	101
七 摆挑子之谜.....	121
八 重返政治舞台.....	135
九 “神话”时代的鼓吹者.....	148
十 报一剑之仇.....	162
十一 “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”.....	180
十二 奇案起家.....	193
十三 一桩哲学公案之谜.....	205
十四 月晕而风.....	245
十五 向林彪“献礼!”.....	271
十六 后院失火.....	285
十七 迫害狂.....	317
十八 “怀仁堂摊牌”.....	355
十九 文 盗.....	373
二十 “保驾”.....	398
二十一 “揭发”之谜.....	426
附录:康生生平简表.....	457

引 子

一位文学家说过：历史——如长江大河。能在长江大河中兴风作浪的，不是功臣，便是罪人。

“阎王爷总算长眼睛，把这个魔鬼召回阴曹地府去，不让他再造孽了；他再活下去，可怎么得了呵！他非把人折腾得死绝了才算数！”

这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晚八时，人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中听到一个讣告之后，不约而同发出的反应。

这一天，天色阴沉，乌云密布，狂风大作，是入冬以来最冷的日子。阴冷的天气，令人郁悒；无休止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更加重了人们内心的压抑感。除了刺人神经的高音喇叭在声嘶力竭地吼叫，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氛正笼罩着美丽而又古老的首都北京。

人们忽地听到了这个消息，从郁悒中感到一阵欣慰。他终于离开了人世，这不仅是思想界的福音，也是全国人民的福音。有人弹冠相庆：“来，干一杯！”有人端起酒盅向志同道合者贺喜：“但愿阎王爷把这些造孽的人，一个一个都召回阴曹地府去，祝他们早日归阴！”

这个他究竟是谁人，为什么民间对他有如此大的愤恨？

这个讣告，报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、政治局常委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去世的消息。康生，在神州大地可谓家

喻户晓，一提起他，人们不免都会谈虎色变。这不仅是因为他权势盖天，而且也是由于他多少年来凭那阴险、狠毒的一手，在宦海生涯中得以经久不衰。在那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，一个人的命运，宛如走马灯，忽明忽灭，唯独他是例外。虽然他也并非百战百胜，而是曾经失过利，呛过水，但他呛水时，张张嘴，甩甩头，镇静一会儿，就又能继续在政治漩涡里打滚，扑腾上来，把对手一个一个地置于死地。

他的这一手，在中共党内是独一无二的。他在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制造第一张“马列主义大字报”，以及“二月兵变”、“六十一人案”、“保女皇”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，都立下了盖世“功勋”。他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“擎天柱”。如今他的倒下，令震撼世界的“文化大革命”都黯然失色了；对显赫一时、以造反起家的暴发户们，也无疑是敲响了丧钟。

一 胶县富户

一八九八年冬日的一天，夜幕刚刚降临，空中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。古老的大台庄，笼罩在一片黑白混沌之中。

高门大院的张家，过早地把大门关上了。院子里的东厢房，不时传出一位女人的痛苦呻吟，一阵紧似一阵。

忽地，“呜哇，呜哇……”一阵婴儿清脆的啼哭，打破了院里令人窒息的沉寂。张发祥正在正房的客厅里，焦急不安地走来走去。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自远而近，房门打开，老妈子兴冲冲地跑了进来，道了声万福：“恭喜老爷，太太生了个公子！”

张发祥脸上露出笑容，兴高采烈地奔向东厢房。他早已胸有成竹，如果是生个儿子，就叫张旺，取张家人丁兴旺之意。

这个刚出生的婴儿，就是本书的主人公。他后来几度易名，最后叫康生。

张发祥抱起刚刚洗过的婴儿，仔细地端详着，顿时喜上眉梢。“小公子长得多大，”老妈子在旁边讨好说：“大眼睛，多白净，多像老爷呀！将来准聪明伶俐，一定是大富大贵的命。”张发祥笑得嘴都合不上了。

张氏家族，住在山东省胶县利民区大台庄，是当地闻名的祖传大地主，家大业大，有钱有势。

康生的曾祖父名张鸿义，是个贡生。贡生，在清代，属于高级知识分子阶层；它是由府、州和县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生员，是世人谋求飞黄腾达的一条必由之路。

康生的祖父一代，有兄弟两人，兄叫张抱先，弟叫张葆元（即康生的祖父），都是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。

康生的父辈，弟兄三人。老大叫张呈祥，是个廩生。廩生，即清代由府、州和县按时发给银子、粮食以补助生活的生员。其堂号称“北树德堂”，他是康生的伯父；老二张发祥，秀才出身，堂号称“南树德堂”，他是康生的父亲；老三张其祥，堂号称“宝善堂”，他是康生的叔父。

张家原有六七千亩地，除少量留下种菜，其余都租给佃户，每年收地租几十万斤，这在胶县是首屈一指的富户。

到了康生父辈这代，一家分为几股。康生家仍然有近两千亩地，房屋几十间。那高门大院，青堂瓦舍，雕梁画柱，远看就像一座神秘威严的城堡，鹤立鸡群，颇有大寨主的威风。

张旺渐渐长大了，他聪明伶俐，也很淘气，是父母的骄子。张旺在叔伯兄弟中，排行老六；在亲兄弟中，是最小的一个。老儿子，又聪慧机灵，自然是另眼相看了。张发祥望子成龙，他把光宗耀祖、扬名显亲的指望，都寄托在张旺的身上。

转眼张旺就八岁了，他像匹野马似的，只知道昏天昏地贪玩；张发祥为了管住张旺，特意请来一位私塾先生，给他教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四书五经》等，让他学点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之类。张旺一直念到了十三岁。

这一年，正是天下大乱的一九一一年。神州大地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件——辛亥革命。

平地一声雷，主宰神州大地近三百年的清王朝被推翻了。真龙天子，金口玉牙，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皇帝，居然被凡夫俗子推下龙廷的宝座。这是亘古未有的新鲜事。改朝换代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稀罕。但废除帝制，却还

是头一遭。

住在偏僻农村的张家，是一个封闭式的家庭。虽然革命后时局变了，但张家依然因循守旧，走着往日的老路，就像一滩死水里扔了块石头，激起几个浪花后，转眼又平静下去了。

张家的匾额、堂号，丝毫未变。“天地君亲师”的牌位，依然供奉在正房中间的客厅里。与此同时，胶县县城已经办起了“洋学堂”，一些开明士绅，纷纷把子女送去读书，学点新知识。唯独张家不同。有人劝张发祥也随着潮流走，但他却不屑一顾地说：“我孩子不学那些洋玩艺儿，那是离经叛道，违背老祖宗的东西。”就这样，张发祥在张旺十三岁念完私塾后，宁肯让他闲散在家，也不愿送他去洋学堂。

五年的私塾，张旺一知半解地懂得了些盘古开天地、三皇五帝、历代王朝兴衰……等等。在农村，也够得上识文认字的小书生了。但他又是个一瓶子不满、半瓶子还晃荡的人，整天吃饱了，没有事干。他和同龄的几个哥儿们，从早到晚，东游游，西逛逛，谁也管不住。

张旺的衣着打扮，在大台庄，也十分显眼。虽然他十三岁时，长袍、马褂、疙瘩帽，这身标志清王朝的国服，已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进了坟墓，但他却与众不同，仍然身穿长袍马褂，头戴疙瘩帽，后脑勺上还拖着一根又长又大的辫子；手里拉着板胡，嘴里吹着笛子，同拜把子哥儿们，喝酒，赌博，吹拉弹唱，甚而打架斗殴，闹得鸡犬不宁，四邻不安。

大台庄议论纷纷：张家知书达理的，怎么出了这么个有娘养无娘教的东西。从张家门口过，见到张家大门上贴着苍劲有力的对联：“家有余粮鸡犬饱，架上书多子孙贤”，有人狠狠地啐了一口：“呸！挂羊头，卖狗肉，什么子孙贤，是无赖！”

夜！万籁俱寂。张发祥在客厅里，反剪双手踱着步。邻人对张旺的斥骂，他已听到。如此下去不只败坏家风，也会把他自己给毁了。俗语道：“养不教，父之过”，再不能让他这样放荡不羁了。“这个孽种！”张发祥气得浑身发抖，咬牙切齿地横了心：“非严格管教不行，这简直是个败家子！”第二天，他便把张旺关了起来。

张发祥以为如此一来，儿子就会改邪归正。但张旺已不是三、五岁的孩子，眼珠一瞪，吼叫几声，就会吓得魂不附体，乖乖听话的。眼下的张旺，不仅脑子灵，点子多，还有一群为他通风报信、出谋划策的拜把子兄弟。单靠关起来，是无法让他收敛野性的。

只要张发祥不在家，张旺便可以在“囚室”里邀朋会友，商量对策。张发祥一迈进大门，信息立刻会传到“囚室”，顿时鸦雀无声。就这样，经过几天的策划，搭救张旺出“狱”的妙计终于想出来了。执行这条妙计的最佳人选，自然是张旺的好友陈舜庭。他能说会道，足智多谋，是张家的常客。

一天傍晚，陈舜庭走进张发祥的屋里。“怎么，”张发祥抬头望望，气鼓鼓地说道：“你是来做说客，为张旺说情的吧？我告诉你，张旺不改邪归正，就休想出去，你们在一块都干了些什么！”

“大伯！”陈舜庭以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和张发祥对阵，他笑眯眯地说：“在这方圆几十里内，哪一个能有张旺这样绝顶聪明。”他一伸大拇指头：“不是我夸海口，他可是百里挑一呀。”让他出去闯闯，说不定将来会有出息，成为一个大人物呢！就连宋朝创业主赵匡胤，年轻时候还吃喝嫖赌抽，无所不为，最后夺取天下，当了开朝皇帝，威震八方，名扬四海。有的人，

虽是老实，可什么也干不成。

这一席话，令张发祥有点动心。自把张旺关起来后，张发祥有如手抱刺猬，抱着扎手，扔又扔不下，进退维谷。张旺已不是小猫小狗，而是个大活人了，总这么关着，也不是长久之计，传出去也不好听。“让他出去闯闯吧！成不成气候，听天由命了！”张发祥下了决心，但一定要有几条约束，不然出去后，还像现在这样，那不是要惹大祸吗？想到这，他讨价还价地说：“出去可以，但有个条件，”“什么条件？”陈舜庭见大功告成，高兴极了，他一拍胸脯，打下保票：“大伯你说吧，我保证他做到。”

“你们必须去念书，”张发祥严肃地说：“你们都不到二十岁，正是求学上进的时候，不能荒废学业，我们张家是书香门第。张旺念了五年私塾，那顶什么用？真正光宗耀祖、扬名显亲，念那么点书太少了，还要继续深造！”说到这停一停后，接着又道：“第二，出去不能惹祸，要安分守己，规规矩矩，不能让人指着后脊梁骂！”陈舜庭满口答应。

打这起，张旺改名宗可。他从“囚室”放出来后，同拜把子兄弟陈舜庭一道去了青岛礼贤中学读书。这是一间赫赫有名、非一般贫寒子弟所能入读的学校，於德国占领青岛的第三年，即一九〇〇年，由德国同善教会牧师理查德·卫立姆一手创办。

礼贤中学的教学宗旨，是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即把中国封建社会的“三纲五常”、“四书五经”和西方社会的科学知识揉合在一起；它规定了约法三章：一，闭门读书；二，不过问政治；三，不参加社会活动。张宗可在礼贤中学的几年，学到了在穷乡僻壤的私塾里学不到的许多东西，他对德国崇拜得

五体投地。

一九一七年，张宗可十九岁，他从礼贤中学毕业了。他本想找个工作，从此脱离那落后的偏僻乡村。可是，天不遂人愿，不论在政界，抑或军界，都未能谋得一席之地。无可奈何，只好打道回府了。刚返故里时，张宗可整天耷拉着脑袋，闷闷不乐，念了这么多年书，连个出路都找不到。他消极悲观，怨天尤人，颇有怀才不遇之感。

不久，张宗可突然遇到了一件使他丧魂失魄的事。

一个风雨交加、电闪雷鸣的夜晚，几个土匪突然从墙上跳进张家。“都给我滚起来！”持枪者双目瞪得溜圆，杀气腾腾地吼叫着。顿时，张家老小慌作一团。张宗可的哥哥，见势不妙，撒腿便向外跑，只听“叭”的一声枪响，人应声倒在血泊里，当场被打死。

土匪翻箱倒柜，把张家折腾得底朝天。全家吓得魂飞天外，惶惶不可终日。“一天也不能呆下去了！”洋学堂毕业的张宗可，心惊胆颤地对他父亲说，“快搬到县城去吧！”

一筹莫展的张发祥，一时没有了主意。不走吧，人命关天，说不定什么时候，土匪会再血洗大台庄；走吧，故土难离，房子都得扔下，还要花一大笔钱重新置业。他犹豫了一阵，最后终于打定主意：保命要紧，他在诸城县城买了一块地皮，大兴土木，很快就建成了一幢公馆。

新建的公馆，气魄非凡。深宅大院内，一排正房，加上东西厢房各六间，另有一幢两层小楼。临街一头，还修了一个讲研究的门楼。张家又成为诸城县的名门望族了。

一到诸城，张宗可即改名为张裕先。一九一八年，张裕先已是二十岁的青年，他进了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。

一年后，张裕先在教师讲习所毕业。他旧念不忘，仍想在军界和政界里谋职，但奔波一阵子，都无功而回。最后，只好到他最看不起的地方（所谓“家有二斗粮，不当孩子王”），即诸城县立高等小学教书去了。

就在这一年，以巴黎和会为导火线，北京爆发了“五四”运动，学生们义愤填膺，高举反帝反卖国政府的大旗，走上街头，游行示威。很快，这股革命的浪潮，由北京传到青岛，再传到诸城。它像冲开闸门的波涛，水急浪涌，泥沙俱下，将抱有各种人生观念的人都卷了进来。年轻的张裕先亦不在外。

一九二四年夏天，张裕先又告别家乡，奔往当年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，张裕先离家出走的原由，历来有两种说法。一说是他赌钱，欠了阎王债，呆不下去了；另一说是他在家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混不下去了。

一到上海，张裕先又改名张耘，进了上海大学读书。这间大学是一九二三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，国共两党在原东南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联同创办的。李大钊推举原在上海震旦大学的同窗好友于右任担任校长。但于右任只挂个名，真正掌握学校管理大权的，是总务长邓仲夏，教务长瞿秋白。这是中共为自己培养干部的一间学校。

张耘在上海大学读的是社会科学系，系主任由瞿秋白兼任。瞿秋白是一位多才多艺、学识渊博的学者，既主持教务行政工作，又亲自向学生授课。

这间大学可说是藏龙卧虎，集中了未来的国家栋梁，中共的精华。学校里洋溢着革命气氛。巨大的革命洪流，冲击和考验着校园内的每一个人。

夜幕降临了。嘈杂的上海，开始宁静下来。正在上海大

学就读的张耘漫步在黄埔江畔，反复思忖着自己的出路。孔子曰：三十而立。自己已二十六岁，离三十不远，该作出抉择了。摆在面前的出路，明显的是两条：一条是花一大笔钱，托托门路，在军界、政界或教育界，混上一个差使，将来运气好了，说不定能捞上个一官半职。可是，这笔钱从哪里来呢？天上掉不下来，家里又闹翻了。再说，也找不到这样有力的后台。“此路不通，”他摇晃着脑袋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有钱能使鬼推磨，现在手中无钱，谁给你白推磨？！”

另一条路，是把“注”押在革命上面。无疑，这是要冒风险的。但是，既有那么多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参加了进来，他们都不是凡夫俗子，而是才华出众的人，这股势力是不能小看的。现在，鹿死谁手固然未见分晓，但未来的天下很可能是属于他们的呢！刘邦在小沛时，不就是手无寸铁的区区小吏吗！后来却成了汉高祖。豁出去了，冒一次险吧。如今积极参加打江山，将来一旦夺取天下，总会论功行赏的。赌钱还有赢有输呢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

于是，他决定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。一九二五年，是他生命旅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。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走上了革命的征途。

这一年的二月，上海爆发了闻名世界的“二月罢工”。二十七岁的张耘，参加了这次罢工。这是他入党后的头一次革命活动。

通过这次实践，他感到自己有非凡的才能，虽然暂时还不能同党内的一些著名领袖平起平坐，但相距也不会太远。他要在中共夺取天下的战斗历程中显露身手。他把自己和同辈的党的骨干作了比较，论文化、论能力，决不会低于他们。只

是他晚来一步，没有捷足先登而已。这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周瑜不是比鲁肃、黄盖资历更浅吗？一个人的成就是由机遇、勤奋、才华构成的。眼下勤奋和才华已具备，所差的是机遇了。“等吧，机遇、运气总会有的！”他心里这样盘算着。

同年夏天，张耘和好友孟超、李宇超一起回山东诸城探亲。他是以当时最时髦的国民党左派身份，出现在父老乡亲面前的。他走起路来，昂首阔步，神气十足。前来探望的，打听消息的，谋求出路的，络绎不绝。张耘为此而感慨万分。一年前，他因为欠赌友的阎王债，和调戏父亲的小老婆，被赶出家门。那时，他简直陷于“虎落平阳被犬欺，凤凰落魄不如鸡”的处境，谁都看不起他。哪知时来运转，一进上海大学，便找到了出路。真是“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这不是别的，而是天时地利人和加能耐。那些过去为追讨阎王债曾经要他白刀子进去、红刀子出来的赌友们，也都一反常态，登门赔礼道歉，并想借重他的权势，另谋出路。而他，都满口应允：“有机会，我一定帮忙。”

他父亲也改变了态度。一年多的时间，儿子便有这么大的出息，虽然还没有爬上显赫的地位，但已算出类拔萃了。这次回来，尽管不是光宗耀祖，扬名显亲，毕竟也替张家增添了光彩。儿子过去的一切不良品行，顿时都烟消云散了。张发祥笑逐颜开，热情地款待张耘，有这样的好儿子，他感到自豪。

一向死气沉沉的张家，这时突然热闹起来。亲友们不辞劳苦，长途跋涉，专程登门拜访。“三岁看老！”亲友们奉承说，“张旺小时候，我就看他有出息。多聪明的孩子，一目十行，过目成诵，在咱们这方圆几十里内，你能挑出第二个吗？”亲友们的一片赞扬声，令张耘踌躇满志，得意万分。他在家住

了一段日子后，便返回上海了。

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深夜，酝酿已久的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终于爆发了。担任上海大学中共特支委员会书记的张耘，积极组织上海大学的学生，参加了这次武装起义。

其后，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和三月，张耘又参加了上海工人的第二、第三次武装起义。这时，他已担任中共沪东区区委书记。在充满激情的工人运动的巨大浪潮推动下，血气方刚的张耘，双眸放射出闪闪光芒，他似乎从未来的中国的光明之中，看到了自己的出路。将来的天下是属于工人阶级的。自己是其中的一员，又是领导者，名誉、地位和权势，自然不在话下了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这一年的四月十二日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，突然与中共翻了脸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，在突如其来的袭击之下，遭到了致命的打击。

在这严峻的日子里，革命阵营内部也发生了分化：有跪在敌人面前屈膝投降的；有夹着尾巴落荒而逃的；有踏着烈士血迹继续顽强战斗的。当然，也还有玩弄权术的投机者，他们总是在伺机窥测，以求一逞。

权术，在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，因应了统治阶层内部权力斗争的需要，长期存在着，并不断有所发展。它既是一门学问，又是一种艺术。运用得炉火纯青者，可以一步登天；反之，弄巧成拙者，则会招来身败名裂之祸。

熟悉中国历史的张耘，对盛行于封建社会的权术，深感兴趣，而且他还将现代的“生意经”、“赌博经”与之揉合到了一起。在他看来，眼下搞的政治投机，就是一种权术的运用，它虽不是现钱交易，却有可能在将来为他赢得权力和地位。目

前需要的是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随机应变，看准机会下“注”。

一九二八年六月，中共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。大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瞿秋白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，都作了批评，最后更换了中央领导，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中央总书记。

机灵的张耘一眼便看出，向忠发这位总书记，是聋子的耳朵——虚设，他缺才少德，没有文化，性格粗暴，处理问题鲁莽，在他身上下功夫，那是瞎子点灯——白费蜡。党的实权是在李立三手里，在李立三身上下功夫，投点“资”，准能名利双收。

正是这时，在一次党的会议上，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激动地说：“我认为李立三同志，担任领导工作这段时间，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，很多人作了无谓的牺牲，令人很痛心，再也不应该这样蛮干下去了。”

张耘参加了这次会议，他看准这个火候，作了针锋相对的发言：“李立三同志是正确的。”他拍着胸脯，气势汹汹地指责批评李立三路线的人说：“谁反对李立三同志，谁就是反党，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，我坚决拥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。”顷刻间，他得到了李立三的赏识。李立三没有辜负张耘的一番苦心，很快地把他由江苏省委组织部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。

然而，政治风云，变幻莫测。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四至二十八日，瞿秋白和周恩来受共产国际委托，召开了党的三中全会。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，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遭到了批评。